

语言的偶然与无根基的民主

陈四海,郝如意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新乡 453007)

【摘要】罗蒂通过对传统媒介语言观的拒斥,阐述了他的语言偶然性思想,并进而论述了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罗蒂认为根基的铲除并不能过渡到对于价值的否定,只要我们抛弃传统的哲学和语言观,无需哲学奠基就能够捍卫这些价值。罗蒂给我们展示了在后现代语境下捍卫传统价值的超人智慧。

【关键词】偶然;反讽主义;后哲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08)02-0067-03

在破除传统形而上学对于基础和本质的探究上,罗蒂和现代思想家是一致的,但他对启蒙批判持保留态度;在维护传统价值和启蒙精神上,罗蒂和哈贝马斯站在一起,但他对诉诸交往理性能否建立普适原则深表怀疑。罗蒂认为我们仍然有义务为偶然的信念承担责任,原因在于通过语言的再描述,我们可以敏感地感知其他人类的苦难,并且这些苦难恰恰是我们也可能遭受的。他的基本思路是想要达到人类团结和自由民主的目的,须诉诸于想象力而不是论证。他的想法正是基于语言的偶然性思想而展开的。

一、语言的偶然

罗蒂是以对传统镜式哲学的批判开始他的独特思考的。虽然在破除意识再现实的镜式哲学方面,罗蒂受惠于分析哲学,但他认为分析哲学所带来的语言学转向不够彻底,仍然在纠缠于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分析哲学用语言代替了意识来作为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媒介。分析哲学所带来的语言学转向实际上在利用“语言”来代替“心灵”或“意识”来作为界于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媒介,罗蒂认为分析哲学的这一替换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关于意识所问的那一类问题,现在同样可以拿来质问语言”^{[1](P21)}

罗蒂认为语言作为再现或表现媒介的观念必须抛弃,因为观念论和实在论,浪漫主义和道德主义所据以争论的概念可以轻易地从“意识”的术语转化成“语言”的术语。“那么,浪漫主义和道德主义、观念论和实在论之间像翘翘板一样的拉锯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1](P21)}而罗蒂认为我们必须跳下这个翘翘板,才能解决它们的争论,而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在抛弃旧的语言观方面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

罗蒂试图借助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来破除“语言媒介观”。哲学对于隐喻的关注并不把它局限于一种和明喻相对应的修辞方式,而是试图把隐喻作为解答词语意义的钥匙。一般的哲学家都认为:隐喻是和词语的字面含义不同的意义,如约翰·希克认为“隐喻性言语是语言的一种用法,在其中言说者所要表达的意义不同于字典上的意义”。^[2]区分词语的字面和隐含会造成这样一种困难:当言说者并没有说出他要表达的内容时,如何被别人理解,交流何以可能?

戴维森的隐喻理论相当独特并克服了这种困难。戴维森在《隐喻的含义》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隐喻理论,他认为区分隐含和字面会造成理论上的困难,隐喻和语言的通常使用不是意义的不同而只是用法的不同。隐喻不存在超出其字面意义之上的言外之意,隐喻和字面意义是一致的。“隐喻是通过对话词和语句的富于想象力的运用而造就出来的某种东西,隐喻完全依赖于这些词语的通常意义,从而完全依赖于这些词语所组成的语句的通常意义”。^[3]戴维森反复强调的主要论点是:隐喻和其他言说的差别是使用上的差别而不是意义有别。和其它语言哲学一样,戴维森认为对于隐喻的转述翻译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发展演变就是隐喻不断本义化的过程,如同“珊瑚礁”的形成过程

一样。

罗蒂认为要想知道戴维森隐喻理论的重要性,必须一方面和柏拉图主义与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和浪漫主义加以比较对照。柏拉图主义和实证主义认为语言的目的在于再现外在的隐藏实在,因而隐喻是毫无用处的,这是一种化约论的观点;而浪漫主义则认为语言的目的在于表现我们内在的隐藏实在,因为隐喻是奇怪的、神秘的和了不起的。戴维森对柏拉图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浪漫主义都展开了批驳,既肯定了由于语言通常用法的局限性,我们不得不凭借隐喻进行交流,同时认为隐喻只是用法不同,而没有特别解释出本质的意义。罗蒂认为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抛弃“语言是媒介”的观念。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个别的语句时,我们容易产生是世界决定我们认识的真假这一幻觉。例如,当我们观看一场比赛是“红队获胜”还是“黑队获胜”看来是由比赛来决定的。语言哲学对于命题的关注及其科学主义的诉求正是建立在这—幻觉之上。罗蒂认为我们必须从语句层次提高到语言游戏的整体层次,从语言游戏整体出发,那么可以发现我们对于世界的描述其真假并不由世界来决定,库恩对于科学知识发展过程中“范式”转换的描述,福科对于知识型的见解都揭示了我们的认识并非对于世界的准确描述,而总是受制于一定的语言游戏和认识类型,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到爱因斯坦,他们用不同的语言游戏描述了这个世界,但并不表示这个世界就是他们所描述的世界。不同的语言游戏是人类用来达到特定目的的不同工具而已。

罗蒂借助于戴维森的语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对于语言的看法:“我们的语言根本无所谓适合于前语言的意识,因为这种意义之下的意识并不存在;哲学家的职责也不在于利用语言表述我们对事物本性的深层意识,因为此所谓深层意识只是子虚乌有”。^{[1](P28)}

罗蒂关于语言偶然性的论述很明显不是针对语言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任意性而言的,他主要针对的是语言的媒介观。所谓语言的偶然性是指语言并不是自我把握世界的标尺,语言的意义也并不在于它同实在的符合度。罗蒂所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从来不会对不能在实践中造成任何差别的纯粹形而上学问题感兴趣,罗蒂关于语言偶然性的论述是为了更好地来实现他对自由主义社会的辩护。

二、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

康德的第三个二律背反和他对认识和实践的区分肯定了在本体论上人的自由状态,即人具有不受因果律决定的自由意志。在关于自由意志的根据上,康德只是把它作为悬设而已,这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试图把它建立在共通的人性基础之上是不同的。罗蒂虽然对康德颇多微言,但在自由意志无法证成这一点上,他无疑是欣赏的。^[4]

罗蒂认为要想实现自由主义的希望,并不在于我们透过理性为其找寻不可辩驳的理由。而是要改善我们对于自由主义希

望的描述,新的描述将唤醒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认同,从而实现自由主义的希望。罗蒂破除了为民主进行哲学奠基的科学主义的企图。他意在以非理性主义的、非普遍主义的方式重新描述自由主义的希望。并且指出,以这种方式来描述,将会比旧的描述方式更能促进这些希望的实现。为此,罗蒂构造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嘲讽主义者的形象。作为自由主义者,他相信我们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作为嘲讽主义者,他看到自己信念和欲望的偶然性,不再相信信念和欲望背后还有一个超越时间和机缘的基础。罗蒂所描述的正是以自身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后现代哲学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他们同时坚信我们已经实现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以及我们试图建立的更理想的社会状态都是值得珍惜的。但他已不能像启蒙运动的先驱们那样自信地诉诸理性以求价值的证成了。罗蒂所讲的嘲讽主义者就是抛弃语言媒介并秉持语言偶然性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认识到我们在一个社会生成,通过这个时代的语言塑造了我们自己,并用这些语言来说服自己和别人。

嘲讽主义者的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观点以及对启蒙主义的批评,引起了哈贝马斯等仍忠于启蒙使命的现代思想家的不满,哈贝马斯认为嘲讽主义者对启蒙主义的批评,势必会瓦解自由主义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罗蒂对哈贝马斯的批评和质疑,进行了必要的澄清。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的政治自由要求人们对于什么是普遍的人性有某种共识。罗蒂则认为理想自由主义社会的凝合剂,不在于普遍的人性,而在于这一共识——相信社会组织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尽情发挥自己的能力来从事自我创造。罗蒂把哈贝马斯的质疑分为两个问题:嘲讽主义会不会瓦解自由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怎么可能既是私人的自我创造,又是公共的自由主义者?罗蒂认为第一个问题实质上是在问嘲讽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的观点在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会不会瓦解自由主义社会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罗蒂以18、19世纪宗教信仰的没落作为类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宗教信仰的没落使得人们无法相信死后报偿的观念,这将会削弱自由主义社会。事实上,宗教信仰的没落不仅没有削弱自由主义社会,反而加强了。这是因为“为了未来的报偿而愿意忍受目前的苦难,已经从个人的报偿转变为社会的报偿,从将个人的希望寄托在天国转变为寄托在自己子孙上。”^{[1](P122)}

罗蒂认为,将自由主义社会凝合在一起的,既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形而上学家的哲学,而是共同的语汇和希望。嘲讽主义者不需要为人类团结提供理据,加以证成。当人们对文化的公共修辞有所怀疑时,他不是以苏格拉底式的对定义和原则的追求来回答,而是以杜威式对具体选项和计划的追求来面对。

第二个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嘲讽主义者何以可能的问题。人们通常感觉嘲讽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非常疏远,而形而上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则相当紧密。人们甚至认为嘲讽主义者必然是反自由主义的。罗蒂指出这是因为嘲讽主义者认识到再描述所具备的巨大威力,他暗示人的自我和世界可以通过再描述而变得一文不值,嘲讽主义所暗含的再描述会对个人用语言来了解自己的能力构成巨大威胁,因而使得人们为之忧虑重重。

罗蒂认为“再描述乃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非嘲讽主义的专利”,^{[1](P128)}只不过形而上学家标榜理性,用论证作为幌子,掩饰了再描述。嘲讽主义者和形而上学家对待再描述的态度是不同的,因而导致人们将自由主义和形而上学家,反自由主义和嘲讽主义联系起来。形而上学家认为,再描述和力量是息息相关的,正确的再描述可以使我们自由。反之,嘲讽主义者就不曾提供类似的保证。她不得不说,我们得到自由的机会视历史的偶然而定,我们的自我再描述只是偶尔才会影响历史的偶然。

因此,嘲讽主义者建议人们不应该像形而上学家那样去寻找为什么要关怀苦难的理由,重要的不是发现这类理由,而是,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苦难的存在。并且在有可能侮辱到另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终极语汇的人时,我们不会被自己的终极语汇所局限和蒙蔽。

三、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实现

嘲讽主义者不相信有一个在时间和机缘之上的秩序可以决定人类存在的意义,在大多数非知识分子仍然坚信宗教信仰或某种启蒙的理性主义的情况下,他们似乎不仅与民主格格不入,甚至与人类团结为敌。罗蒂认为“与一个受到特殊历史制约的,可能短暂的团结形式为敌,并不就是与团结本身为敌”。^{[1](P128)}罗蒂提出了一个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设想,在这个乌托邦中,嘲讽主义具有普遍性,在自由主义乌托邦中,人们不再把团结看作是必须被承认的事实,而且是大家努力所想达到的目标。达到目标的方式,不是研究和讨论,而是透过想象力,把陌生人想象为和我们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

在我们的思想语境下,乌托邦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否定色彩。但是对于罗蒂所代表的西方现代知识分子来讲,“乌托邦政治乃变成知识分子间的常规,而不再是异议”。^{[1](P11)}他们认识到任何关于人类未来的筹划在切实改变人类之前我们是无法准确预知其结果的,因而乌托邦的设想作为对于未来的积极描述其价值不在于社会的实际发展是否与规划相一致,而在于它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从而促使人们创造出更为自由和民主的未来社会。“乌托邦政治将上帝意志和人性问题暂时搁置不谈,而去梦想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形式”。^{[1](P11)}罗蒂所讲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同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所做的对于未来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筹划不同,他并没有具体地指出在其中应该以什么具体的方式来展开我们的生活,他更多的是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未来社会的生动思想场景。

罗蒂看到在后现代思想的启蒙批判面前,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一溃千里,因而危及到了通过理性来为自己辩护的现代社会的价值。所以他把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自由民主划清界限,理性主义的“粗暴”虽然需要驯服,但自由民主不可动摇。他指出“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语汇,虽然与自由主义民主的肇始息息相关,但已经变成了民主社会延续与进步的障碍”。^{[1](P67)}罗蒂同时在两个战线作战,一方面对启蒙批判的后现代思想家喊停,要求他们停止对于启蒙精神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自由和民主的攻击;另一方面他对忠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思想家示警,说服他们抛弃普遍主义的论证方式同样能完成价值上的辩护。

罗蒂的英勇作战和腹背受敌也生动地反映了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敏锐的感知到理性的简单粗暴可能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也不敢再有普遍主义的要求。理性主义的普遍性使得社会的实在性优越于个体的实在性,那么个体的自由和幸福就有可能被僭用社会整体名义的集团所侵害。他们看到后现代哲学打破了理性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这种格局的打破巩固和完善了个体的实在性,私人的完美同公共的团结一样不容侵犯,那么个体的自由就能够更容易的实现。但是社会主义与团结的希望如何实现呢,罗蒂认为我们不能通过对人性的说明来证明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而是要诉诸于想象力,通过语言的描述改变我们对于事物的惯常看法,增强我们对于其他人类个体的认同感,对于其他人类苦难的感知度,这是增强团结的最好方法。罗蒂认为和传统的形而上学家诉诸普遍的理性不同,在自由主义乌托邦中,团结的实现要诉诸于语言的在描述力量。

罗蒂通过他对哈贝马斯质疑的回答表明抛弃了本质和基础观念的嘲讽主义者仍然能够秉持自由主义的信念,这种自由主义的嘲讽主义者是罗蒂所设想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主要社会成员。在自由主义乌托邦中,团结不再是必须被承认的事实,而是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拒绝为社会理想进行哲学奠基,反对将普遍的人性作为自由主义社会的理据是罗蒂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的显著特点。

罗蒂认为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实现有赖于后哲学文化的普及。这一论断是罗蒂两个战线同时作战的成果。他所设想的后哲学文化其实就是坚持自由主义希望的嘲讽主义文化。罗蒂认为启蒙运动的先知们打破了神学的那种至高无上地位,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后神学文化的时代。但在这个文化中,神学留下的空白却由哲学填补了。罗蒂认为既然后神学文化时可能的,那么后哲学文化也是可能的。启蒙运动的先知们使我们摆脱了神学文化,在后神学文化中,哲学取代神学成为各学科的法官。罗蒂认为实用主义者是新的启蒙运动先知,将带领我们进入后哲

学文化。罗蒂认为实用主义“所处的境地与那些主张关于上帝的本质和意志的研究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的非宗教主义者当初所处的境地非常类似”。^{[1](P133-134)}

虽然在柏拉图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看来,罗蒂所假设的后哲学文化是“颓废的”,罗蒂认为这两类哲学都在试图使人类社会受到永恒的东西或世界的限制,他们所提供的根据虽然让这个社会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但其实是一种幻觉。罗蒂认为我们放弃了普遍主义的要求,以一种反讽主义的态度来重新描述社会的价值和希望,能够更好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

罗蒂虽然看到社会发展和语言演进是互动的关系,但他仍然夸大了语言的先验性,似乎我们单凭语言的学习就可以把自己改造成全新的人类。但很多时候,是社会的变迁改变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不得不以全新的语言来言说,并习惯这

种言说而成为一种全新的人类。这个时候,社会的变迁具有同等地位的先验性。这一点罗蒂并非没有认识到,只不过在他潜意识里明白肯定社会的先验性,就会阻碍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阻碍我们创造更为美好的未来。倘若如此,罗蒂的“狡猾”也是值得原谅的了。

[参考文献]

- [1]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约翰·希克.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A. P. 马蒂尼奇.语言哲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责任编辑:陶爱新]

The contingency of language and ungrounded democracy

CHEN Si-hai, HAO Ru-yi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Through rejecting the traditional media language concept, Rorty sets forth his thought of language contingency,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contingency of liberalism society. Rorty puts that eradicating the foundation cannot turn to the denial of values, and as long as we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concept, we will be able to defend these values without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Rorty demonstrates us kinds of superman wisdom to defend traditional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post-modernism.

Key words: the contingency of language; irony; 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上接第60页)

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建立和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是领导班子效能建设的当务之急。一是在政绩的认定上要突出重点。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稳定与和谐建设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首要内容。二是在效能的评价上要客观公正。评价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的效能,不仅要看经济效益,而且要看社会效益;不仅要看所取得的成绩,而且要看付出的成本。三是在考核的方式方法上要创新形式。减少“官考”比重,增大“民考”分量。采取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个人述职与群众评议相结合,定期考核与经常性考核相结合,座谈了解与明查暗访相结合,组织人事部门考核与专业部门考核相结合等形式进行立体化考核。四是在考核成果的运用上要与时俱进。绩效考评不但要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挂钩、同干部任用挂钩,而且要把它作为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优劣及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从而不断激发领导干部工作的原动力和创造力,最终达到创新执政理念、提升执政品位、提高执政效能的目的。

五、营造和谐氛围

提高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实现班子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良性互动,监督制约是保证。一要不断完善班子的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

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作出决定,杜绝专权独断。二要规范班子的民主决策程序。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对重大行政决策要进行合法性论证;对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对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群众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实行民主决策。三要倡导班子的科学决策方法。统筹协调各项工作,使每一项决策都符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并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四要不断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决策活动的监督,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要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要始终将权力的运作置于监督的阳光之下,在进一步实行群众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同时,加大党内监督的力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实行以权制权,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

[责任编辑:陶爱新]